

中国古代的

# 士人生活

■ 孙立群 著

■ 商务印书馆



# 中国古代的士人生活

孙立群 著

商 务 印 书 馆

2004年·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古代的士人生活/孙立群著. —北京:商务印书馆, 2003

ISBN 7-100-03714-X

I. 中... II. 孙... III. 知识分子-研究-中国-古代 IV. D691.7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3)第 007923 号

所有权利保留。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使用。

中国古代的士人生活

孙立群 著

---

商务印书馆出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36号 邮政编码 100710)

商务印书馆发行

北京民族印刷厂印刷

ISBN 7-100-03714-X/K·755

---

2003年12月第1版 开本 850 × 1168 1/32

2004年4月北京第2次印刷 印张 10

定价: 17.00 元

# 目 录

第一章 中国古代士人概说	1
一、士的构成及其分化	1
二、中国古代士人的品格	5
(一) 强烈的历史使命感和忧患意识	5
(二) 儒家的理想人格	11
(三) 道家的理想人格	14
三、中国古代士人的生活	15
第二章 士人的读书生活	19
一、读书的甘苦	19
二、读书的乐趣	23
三、辛勤的藏书人	29
四、精心抄书、护书	37
五、不倦的笔耕者	40
第三章 士人与仕途	46
一、入仕与士人生活	47
二、中举士人的荣耀	55
三、艰辛的入仕之途	62
四、落第士人的出路	71
第四章 士人的衣与食	81

一、士人的服饰 .....	81
二、士人与饮食 .....	90
(一) 名士与名吃 .....	90
(二) 古代士人的饮食观 .....	98
三、士人与酒 .....	108
(一)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魏晋士人与酒 .....	108
(二) “酒正使人人自远”——饮酒之乐 .....	112
(三) 醉中得句若飞来——饮酒与创作 .....	119
四、士人与茶 .....	127
(一) 士人与饮茶之风的流行 .....	127
(二) 品茶之趣 .....	134
(三) 品茶之道 .....	139
五、士人与药 .....	149
<b>第五章 士人的住与行 .....</b>	<b>153</b>
一、士人与家居 .....	153
二、士人与园林 .....	161
三、士人与游历山川 .....	174
<b>第六章 士人与聚会、结社 .....</b>	<b>189</b>
一、士人与聚会 .....	189
二、士人与诗文社 .....	193
三、士人与其他形式的社 .....	196
<b>第七章 士人与琴棋书画 .....</b>	<b>201</b>
一、士人与琴 .....	201
二、士人与棋 .....	212
三、士人与书法 .....	227

四、士人与绘画 .....	241
第八章 士人与青楼女子 .....	251
第九章 魏晋士人的生活 .....	267
一、魏晋士人“贵适意”的生活观 .....	267
二、魏晋隐士及其品格 .....	289
(一) 隐士与政治风云 .....	290
(二) 魏晋士人的隐逸方式之一:苦行僧式的山林之隐 .....	294
(三) 魏晋士人的隐逸方式之二:“吏非吏,隐非隐”的朝隐 .....	297
(四) 魏晋士人的隐逸方式之三:恬淡、自适的田园之隐 .....	303
附: 插图目录 .....	312

# 第一章 中国古代士人概说

## 一、士的构成及其分化

“士人”是中国古代对知识分子的一种称呼。士人也称“儒生”、“文人”。在先秦，士的含义十分广泛，主要有以下几种：

(1)指青年男子。《诗经·卫风·氓》：“于嗟女兮，无与士耽！”《郑风·女曰鸡鸣》：“女曰鸡鸣，士曰昧旦。”孔颖达疏：“士者，男子之大号。”故士女可以并称。《诗经》中不少爱情诗所提到的就是青年男子。

(2)军士，多指甲士。商周时期，士从事的职业主要为武士及各类职事官。春秋以前的战争以车战为主，战车一乘有甲士居车上，《司马法》曰：“长毂一乘，甲士三人。”中间为驭手，左右各一人分别执弓矢或长矛，甲士即武士。每辆战车后面跟随若干徒兵，所以武士也是冲锋陷阵的基层军官。

(3)各级贵族的通称。《尚书·多士》：“用告商王士。”又“尔殷遗多士。”不过“士”更多的是指宗法分封制下的一个等级。按照分封制度，天子、诸侯、卿大夫都要把自己的庶子或宗族兄弟以另立小宗支庶的办法逐层分封出去，士便处于这一宗法贵族等级系列的最末一等。汉人贾谊说：“古者圣王制为列等，内有公、卿、大夫、士，外有公、侯、伯、子、男。……等级分明而天子加焉。”（《新书·

阶级》)士又分为上士、中士、下士三等。许多士在王室和基层行政机构中担任各类职事官。据《周礼》记载,直接为王室服务的职事官达几十种之多,在诸侯公室中服务的士也为数不少。还有许多士在卿大夫的采邑内担任各种官职,其中地位较高者为邑宰、家臣,职责是管理采邑内的各种事务。所以顾炎武在《日知录》卷七“士何事”条中总结说:春秋以前的士,“大抵皆有职之人。”

在这些职事官中,我们可以发现后世文人的原始形态。当时,在政府中有一批掌管祭祀、礼仪、占卜、记事等活动的文职官员,称“作册”、“巫”、“卜”、“祝”、“史”等。他们掌握文化知识,具有文人的特征。不过,他们与春秋战国活跃的士人阶层相比尚有很大区别,他们不是独立的知识群体,其知识还没有形成理论学说,没有达到以知识为资本与社会进行交换的程度。从总的方面看,商、西周时期,宗法分封制保证了士等级的稳定和不断扩充,严格的等级制度又使士纵然有知识和技能也无法充分施展,从这方面看,商周的士缺乏知识主体的自主性,其身份是不自由的。在春秋战国激烈的社会变革中,士摆脱了宗教等级的束缚,获得了较多的人身自由。非宗法性士的崛起,成为政治上、思想上、文化上非常活跃的阶层。

造成士等级分化的原因,从根本上讲是宗法分封制和等级制松动的结果,具体原因有以下几点:

第一,社会发展与变革对智能、知识的需求急剧增长。为了富国强兵,各国都程度不同地进行改革,削弱世卿世禄制,提倡“选练举贤,任官使能”的用人方针,形成了“礼士”、“贵士”、“重士”的社会风尚,这就为士冲破等级制的束缚、施展才干创造了良好的环境。

第二,私学兴起,打破了传统官学的教育模式,使新型文士脱



颖而出。周代的教育制度是“学在官府”，只有士及贵族子弟享有受教育的权利，学校的培养目标是巩固贵族宗法等级制，在春秋社会大变革中，“学在官府”的局面也发生了变化，私人可以讲学办教育。在孔子以前已有私人讲学的现象，孔子则把私人讲学推向新阶段。《史记·孔子世家》载：“孔子以诗、书、礼、乐教弟子，盖三千焉，身通六艺者七十有二人。”在孔子弟子中有各类人才，有的人仕做官；有的经商致富；有的从事教育学术活动，在社会上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孔子兴办私学，明确提出了“有教无类”的办学原则，把原来由贵族垄断的文化知识传到了民间，促进了独立知识分子的形成。



图1 孔子讲学图

在社会变革浪潮的冲击下，士人队伍得到了迅速发展和壮大，他们摆脱了宗法等级制的束缚，形成相对独立的知识群体。在政治形势错综复杂、战争频仍的战国时代，许多士人的理想是“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论语·泰伯》）为了宣传自己的政治主张，他们朝秦暮楚，四处奔走，“合则留，不合则去”；他们坚守道义，个性鲜明，傲视国君，不屈从权势，所谓“士志于道”，“从道不

从君”。他们追求的是“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孟子·滕文公下》）的大丈夫精神。这些都构成了战国士人特有的精神风貌和道德情操，对后世文人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战国时期，士人在获得较多的人身自由的同时，思想也得到了解放，他们打破了思想禁区，竞相宣传自己的思想见解和政治主张，出现了儒、墨、道、法、阴阳、名、兵等众多的思想流派，并互相驳难，各立新说，形成了百家争鸣的局面，将我国思想文化的发展推向了高峰。战国特定的历史环境，为士人提供了施展才华的大舞台。战国士人中涌现出一批杰出的政治家、思想家、军事家、文学家，他们为我国思想、文化、科技的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秦统一中国后，士人的情况发生了很大变化。此时，皇权凌驾于整个社会之上，并支配整个社会。专制的皇权与思想文化多样的发展不可避免地要发生冲突。为解决这一矛盾，历代封建统治者采用各种手段规范、束缚文人的思想和行动。秦始皇的“焚书坑儒”和汉武帝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及隋唐以后的科举取士制度，都是用不同形式对士人进行控制。历代统治者还采取许多措施对士人进行防范，如汉初禁止游士活动，明清大兴文字狱等。与战国相比，秦汉以后文人的自由大大缩小了。

构成中国古代士人的主体是在各类学校就读的学生和参加科举考试的各类举子，如生监、秀才、举人等；还有从事各种文化活动的人，如教师、作家等。由于中国古代许多官员是儒生出身，有一定的文化素养，他们在社会上扮演着双重角色，一方面，他们是国家官员的一部分；另一方面，他们又是社会文化的继承者，他们既能研读经史，又能参与国家管理，还能有出色的诗赋文章传世。一般认为，儒者、文官、诗人三位一体，构成了中国古代士人的典型品

格。

中国古代士人的构成是复杂的。士人不是独立的阶级，而是处于官与民之间，他们可上可下，其活动促使文化传播和社会关系活化。士人内部构成的复杂性和士人社会职业的多样化，不仅使他们的生活水平和生活方式各异，其品德、性格也各不相同。士人中有热爱国家、正气凛然、襟怀坦荡的君子；有思想深邃、博学多才的智者，也有风流倜傥、多愁善感的才子。当然，士人中也有出卖灵魂、丧失人格的败类。对中国古代士人及其社会生活进行研究，将有助于对中国社会和中国文化的深入了解。

## 二、中国古代士人的品格

### （一）强烈的历史使命感和忧患意识

在论述中国古代士人的生活之前，有必要对士人的品格做一介绍。因为士人的理想追求、价值观念、生活情趣、社会品位，无不受到自身品格的支配。品格与“人品”、“人格”相通，是指在特定的历史环境中由其行为所反映的精神面貌。在中国古代士人的品格建构中，最突出的特点是强烈的历史使命感和忧患意识。

历史使命感即积极的人世精神。古代士人把参与国家政治视为自己的“天职”，把“治国平天下”当作崇高的理想追求，他们关心社会现实，“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不少士人入仕后直接参加国家管理，清正廉洁，执法严明，成为贤相、清官，至今为人称颂。有的人虽遭贬谪，仍怀忠君报国之志，在国家、民族危难之时，挺身而出，从容赴国难，视死忽如归，“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论语·卫灵公》）。充分体

现了士人中优秀分子的高度社会责任感和英勇献身精神。

所谓忧患意识，即对民族、国家乃至人类所处困境的认识以及由此而产生的种种忧虑。它较多地体现了人们对现状与前途之阴暗面的认识，反映了现实生活中潜伏着的危机。忧患意识来源于知识分子特有的强烈的历史使命感，来源于他们对社会、民族、国家前途深切的关怀。正如范仲淹在《岳阳楼记》中所说：“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是进亦忧，退亦忧。”“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

古代士人的忧患意识常常表现在对事物的发展具有预见性。比如在王朝和平稳定时期，他们见微知著，察觉到潜伏的危机和面临的困境，预感到即将出现的社会问题，表现出“超前意识”或“危机感”。汉文帝时，贾谊上疏，针对匈奴强大、诸侯势力膨胀等问题，认为，汉王朝像病足一样，“一胫之大几如要（腰），一指之大几如股，平居不可屈信（伸），一二指搐，身虑亡聊。”（《汉书·贾谊传》）当时，社会处在平稳发展阶段，贾谊之“危机感”似乎是危言耸听，但后来的事实证明，他的预感是对的。汉景帝时，晁错针对诸侯坐大，力主“削藩”而引发“吴楚七国之乱”，他预感到“今削之亦反，不削之亦反。削之，其反亟，祸小；不削，反迟，祸大。”（《史记·吴王濞列传》）晁错虽然被景帝错杀，但他以自己正确的判断，巩固了汉王朝。明初，地方教官叶伯巨上书朝廷，认为朱元璋分封诸子为王将来会造成“尾大不掉之势”，难免骨肉相残。果然，朱元璋死后，发生了争夺皇位的战争。事实证明叶伯巨的预见是正确的。但在当时，朱元璋却认为他的话有蓄意挑拨离间之嫌，不少大臣也认为他无中生有，叶伯巨被抓，死于狱中。（《明史·叶伯巨传》）晁错、叶伯巨之死皆因为他们具有知识阶层所特有的对

问题观察的敏感性,能比较清楚地发现某种趋势的发展前景。然而,在现实中,超前的危机感往往不为当政者认同,甚至被怀疑别有用心,这就酿成了许多个人的悲剧。

为什么中国古代士人有如此强烈的历史使命感和忧患意识呢?

首先,与士人产生的社会背景有关。前面说过,士在西周是宗法分封等级序列中最末一位,他们从事的职业主要为武士及各类职事官,还有的在卿大夫的采邑内担任各种职务。士与上级贵族之间有严格的等级隶属关系,政治上有稳固的地位,经济上亦有保障,这就是他们将维护现有制度当作自己的主要使命,而在文化上缺少创造性和进取性。然而,春秋以后,在社会动荡、礼崩乐坏、宗法等级制度瓦解的过程中,许多士人失去了原来的地位和职守,流亡各地,甚至生活也遇到了问题。不过,战国多元化的政治格局和各诸侯国之间激烈的竞争为士人提供了施展才华的机遇。各国为增强实力,亟需政治、军事、外交等各种人才,也为士人参政提供了有利条件。这时不仅公室养士,私门也养士。从士人角度讲,他们为了实现政治理想,也为了解决个人生活问题而乐于参政入仕。一方需要士为自己服务,一方则希望效力以实现个人价值,于是争士养士成为风气,人才竞争十分激烈。这种情况正如顾炎武在《日知录》卷7“士何事”中所说:

春秋以后,游士日多。《齐语》言桓公为游士八十人奉以车马衣裳,多其资币,使周游四方,以号召天下之贤士,而战国之君遂以士为轻重,文者为儒,武者为侠。呜呼!游士兴而先王之法坏矣!

无论从客观环境的需要还是主观需要看,战国士人的参政热

情都得到了强化，他们纷纷投入到政治旋涡之中，有的替君主出谋划策充当谋士；有的著书立说，创立学派，宣传政治主张；有的作为外交使节游说各国，合纵连横。战国士人中涌现出一批杰出的政治家、思想家、军事家、文学家。

正是由于士阶层形成于社会动荡、政治斗争尖锐复杂的战国时期，士人所思所想所作所为多针对天下如何统一、国家如何富强、人民如何治理等问题。孟子曰：“如欲平治天下，当今之世，舍我其谁也？”（《孟子·公孙丑下》）此言代表了广大士人的心愿和呼声。

第二，以儒家为主体的传统文化的影响。儒学是战国诸子百家的一大流派。儒与道、法三家是战国最有影响的思想流派。到汉武帝时期，儒学被抬高，“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儒学成为经学、官方哲学，逐渐在中国文化中占据了主导地位。儒学是一种主张积极入世的学说，其创始人孔孟都极力主张士应入仕从政。孔子说：“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他认为“治人”是上乘的大道，是士应该从事的事业。所谓“学而优则仕。”而“治物”是下乘的小术，是劳力者所为。孟子则说：“士之仕也，犹农夫之耕也。”“士之失位也，犹诸侯之失国家也。”（《孟子·滕文公下》）在孟子看来，由士而仕，是天经地义的事。士就应该辅佐帝王，为君主制定治国方略，代圣人立言，作帝王思。儒家关于士人从政的思想对历代文人学子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无数人怀着“治国平天下”的理想，为参政入仕而刻苦攻读，四处奔波。

第三，古代士人强烈的参政意识还与封建统治者的官爵禄的吸引有关。在中国封建社会，社会地位的高低，财物分配的多寡与官爵紧密相联。官爵越高其社会地位和所获财物越多。《管子·

明法解》说：“其所任官者大，则爵高禄厚；其任官者小，则爵卑而禄薄。”商鞅变法有一项就是按照等级分配财产：“明尊卑爵秩等级，各以差次名田宅、臣妾、衣服以家次。有功者显荣，无功者虽富无所芬华。”（《史记·商君列传》）管子将“禄赏”之权视为君主治国的三大宝物之一。这三大宝物为：“号令也，斧钺也，禄赏也。”（《管子·重令》）

自春秋战国以来，历朝当政者均以官爵禄吸引士人参政。汉武帝时设太学，提倡读经入仕；隋唐以后，逐渐完善科举取士制度，一批又一批士人进入官场，使庞大的国家机器保存活力，也使官僚队伍得到更新。同时，入仕也可以改变士人的社会地位和生活状况。战国士人姚贾出身低微，为秦出谋有功，秦王大悦，封姚贾千户，以为上卿。苏秦未入仕之前，穷困潦倒，父母兄弟都不理睬，待游说成功，衣锦还乡，父母张乐设饮，远迎三十里。在古代，文人登科入仕是最荣耀的事。一旦中了举人或进士，便轰动乡里，不仅光宗耀祖，也使四邻生辉。周密《齐东野语》卷16说，宋代进士及第回故里时，“旗者、鼓者、饷者、迓者，往来而观者，阡陌如堵墙。既而闺门贺焉，宗族贺焉，姻者、友者、客者交贺焉。”甚至连“仇者亦如耻羞愧而贺且谢焉。”这样的社会氛围，使士人的使命感和参政意识大为强化。

综上所述，我们对古代士人的强烈的历史使命感和积极的入仕精神可以作如下评价：

首先，应该肯定这种精神是古代士人的优秀品格。正是由于有这样的品格，我国知识分子才有自强不息的精神，为社会的发展和进步努力贡献自己的才智。然而，从另一个角度看，这种强烈的历史使命感和积极入仕的精神又是构成古代士人悲剧的原因之

一。这种悲剧不仅表现在士人投身于国家政治生活所造成的种种不幸和悲哀，还突出表现在以下几点。

第一，强化了做官意识。古代士人欲实现自己的人生理想，惟一的通道就是做官，平民百姓是没有参与国家政治的权利的。只有做官才能参与国家管理，所谓“不在其位，不谋其政。”入世即做官，而官员的名额有限，于是，无数儒生士子拥挤在“学而优则仕”的狭窄通道上，为人仕，他们刻苦攻读，皓首穷经；为保住官位，他们争宠献媚；甚至互相倾轧，最终成为封建统治者的驯服工具和掌中玩物。

第二，由于古代士人迷恋仕途，热衷参政，加之历代封建统治者轻视自然科学，崇尚“义理”，在这种“重道轻艺”的观念支配下，人们普遍认为科学技术不过是“器”，是“艺”，是等而下之的东西，而所谓“治国平天下”的大道理才是最有价值的学问。因此，中国古代无官职的自然科学家、发明家的社会地位不高，他们至多在正史的“方伎传”中留几笔，而不能与政治家相提并论。这种对科技轻视的态度，造成了中国古代士人知识结构不合理，更造成了中国古代社会发展缓慢。

第三，由于特殊的历史背景，古代士人自形成时起，就没有独立的经济地位。他们只能作为统治阶级的依附体而存在，如果不去依附统治者，他们不仅没有社会地位，甚至连生计都成问题。人们熟知的孔子一生坎坷，他热衷入仕，但几次从政并不如意，他最得意的时光不过是在鲁国担任过三四年的中都宰、司空、大司寇。由于他所思所求不合时宜，无法在鲁国呆下去，55岁时，只好带着弟子周游列国，以求依附有权势者，然而他不受欢迎，处处碰壁，以至沦落到有如“丧家之犬”的可悲境地。可见，士人如不依附权势



者,其命运何等可怜!



图2 孔子像

从人格上看,战国士人与后世文人相比,人格是相对独立的。他们在社会上有流动的自由,有选择职业的自由。有独立思考的自由,这是由于战国政治多元、诸侯争雄,各国大量需求人才的特殊环境决定的。但是,这三项自由并未获得政治上的承认和保护,到秦汉封建大一统王朝建立后,君主专制进一步强化,士人的相对独立人格几乎丧失殆尽。

## (二) 儒家的理想人格

由强烈的历史使命感所驱动,中国古代士人对理想人格特别